



荷马史诗导读

◎ 程志敏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程志敏著

荷马史诗导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马史诗导读 / 程志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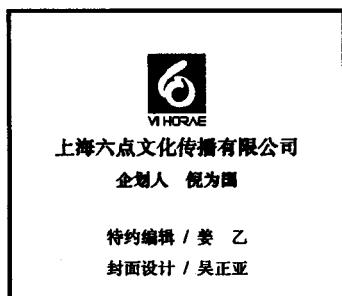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六点学术)

ISBN 978-7-5617-4966-1

I . 荷 ... II . 程 ... III . 史诗 - 文学研究 - 古希腊 IV . 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86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
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荷马史诗导读

程志敏 著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陈锦文
责任制作	李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2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4966-1/I·359
定 价	26.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ούκ ἐνὸν ἀνευ θείας καὶ δαιμονίας φύσεως οὐτως καλὰ καὶ σοφὰ ἔπη ἐργάσασθαι.

Democritus, fr. 21, DK

只有那种具有神圣的和灵异本性的人，才写得出如此漂亮和智慧的史诗。

德谟克里特：残篇 21

Traditum est etiam Homerum caecum fuisse. ut quae ipse non viderit nos ut videremus effecerit.

Cicero. *Tuscul.* V. xxxix. 114

传说荷马是一位盲人。……但他却让我们看到了他自己无法看见的东西。

西塞罗：《图斯卡鲁论辩录》5.39.114

目 录

导论：谁杀死了荷马？ / 1

第一章 作为思想史形象的荷马 / 17

第一节 荷马传说 / 18

第二节 荷马其人 / 26

第三节 荷马之名 / 36

第四节 思想史中的荷马 / 46

第二章 荷马史诗简史 / 55

第一节 英雄传说 / 56

第二节 文本编纂 / 68

第三节 研究历程 / 84

第四节 荷马问题 / 104

第三章 《伊利亚特》的内容与结构 / 119

第一节 各卷内容 / 120

第二节 环形结构 / 139

第四章 《伊利亚特》的多重主题 / 159

第一节 愤怒 / 160

第二节 神明 / 170

第三节 英雄 / 196

第五章 《奥德赛》的内容与结构 / 215

第一节 两诗异同 / 216

第二节 主要内容 / 225

第三节 基本结构 / 239

第六章 《奥德赛》与古典政治哲学 / 255

第一节 生存 / 256

第二节 权力 / 261

第三节 明智 / 271

第四节 诗与哲学 / 281

结语：西方文明之父 / 291

附录 / 295

一、《伊利亚特》的场景(郑漫译) / 295

二、英雄诗系 / 312

三、荷马史诗学术资源综览 / 347

四、荷马史诗大事年表 / 364

五、主要参考文献 / 369

后记 / 375

导论：谁杀死了荷马？

尼采讲过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一个疯子大白天提着灯笼到市场上去寻找上帝，向懵懂无知的人们宣布“上帝之死”的消息。^① 上帝之死成了一个中性的事实，对那些早已把上帝和诸神理解为一种价值并因而习惯于理性思维的人来说，上帝之死或超感性世界的阙如，^② 既不是噩耗，也算不上喜讯，丝毫不触动微澜死水般的精神世界。但那个疯子却说是“我们”亲手杀死了上帝，这就让几千年来素以明智、审慎和理性的“人”由惊讶莫名而愤怒不已：我们不是向来都清白无辜么？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也许还真像疯子说的那么回事。大家这才意识到，尼采的话是一篇祭文，不是追怀上帝之死，而是凭吊人心之亡。

两位很看不起美国精神的美国教授(V. D. Hanson 和 John

^①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 125 节，中文见黄明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0 年，第 151—152 页。

^② 参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第 763—819 页。

Heath),就借用了尼采这个故事祭奠正在死去的“古典学”。^①他们假痴不癫大说“疯话”,时而捶胸顿足哀叹学统断绝,时而呼天抢地悲悼礼崩乐坏,时而破口大骂学者自甘堕落、为虎作伥,时而扼腕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时而深情款款缅怀往昔风光,时而王婆卖瓜兜售古典膏药,时而天真幼稚勾勒教育乌托邦,如此等等,疯得如痴如醉。这两位自暴家丑的古典学者,一路骂将下来,上至时代精神,中至教育体制,下至学人恩怨,无不痛快淋漓。这种疯魔般的喃喃自语似高级牢骚,也似振聋发聩的禅钟,其实有着清醒的目的,就是要寻求一个宏大问题的答案:谁杀死了荷马?

这个问题预设了荷马之死,但面对空前繁荣的出版市场,我们真的能够说荷马已死吗?同动荡不安的60年代比较起来,现在的出版物、课题经费、学术会议以及从业人员不都是成倍增长,现代学术体制不是更为“科学”,学术生产不是更为密集和迅捷?难道古典学这个行当不是与时俱进,反而与时俱进?

是的,古典学问的消亡这一事实不仅凿然可鉴,甚至可以用数字来说明。出版物的畸形繁荣恰恰说明了古典学的荒凉:空泛轻浮的时代哪里容得下劳神费力、毫不实用、崇尚精英、反对民主的古典智慧。尼采笔下的疯子说:“教堂若非上帝的陵寝和墓碑,还算什么玩意呢?”同样地,每年数以万计的论文、专著以及书评之类的论著,连古典学学者自己都看不过来,甚至不屑一顾,那不是古典学坟头上茂密的杂草,又算什么玩意呢?就连专

^① V. D. Hanson and John Heath. *Who Killed Homer? The Demis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Greek Wisdo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8). 这篇导论主要是介绍这本书,下引此书,随文夹注。

业的古典学研究者都随波逐流物竞新奇，生造术语互相吓唬，以胡说充深沉，用无知封杀学问。被打入冷宫的古典学之所以奄奄一息，终欠一死，只是迟早的事情，不过还有几个自以为砥柱中流的酸儒苟延着古典学的残喘而已；荷马之死的消息来得稍为早了一些，“雷电需要时间，星球需要时间，凡大事都需要时间”，若能假以时日，荷马之死指日可待！

专家尚且如此，老百姓搞不懂自己（西方）文化的根源，弄不清历史的来龙去脉，那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况且，在这个“科学”的时代，又有什么必要去探究那些“无用”的东西呢？至于绝对价值、道德廉耻、生命的悲剧意识等等，不过是极少数知识分子赚取润笔、润喉的幌子而已，哪里还当得真！大多数能干的知识分子（包括古典学者）早就不靠那些老掉牙的“高贵谎言”来骗人钱财替人消灾了。希腊语课程逐渐从大学课表中消失，古典学课堂门可罗雀，讲台上的教师差不多成了古典学王国的“末人”了。

西方“文化大革命”前夜（1962年），美国还有70万高中生修习拉丁语，到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这个数字已锐减至15万，后来下滑得更快了。大学的情况也差不多，在1994年授予的一百万名文学硕士中，古典学专业只占其中的区区六百，而且不仅数量堪忧，质量亦每况愈下。即便这类学生为数不多，但也不好分配，往往顾不上专业对口与否，随便凑合一个廉价的工作。如此一来，且不说雄心不再，甚至还可能对古典学产生极大的怀疑和悔恨，高昂的助学贷款如何偿还，谁来为巨大的教育投资埋单？这种比特洛亚城墙还更“现实”的问题，让很多家长和学生对古典学望而止步，缺少血液再生机制的古典学焉得不亡？有许多迹象表明，古典学大厦的“大地震”（cata-

clysm, 即我们所谓大地陆沉, p. 249)已然发生过了, 现在还余震不断。

荷马之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谁杀死了荷马, 为什么? 在没有荷马的时代我们该怎样生活? 为了荷马的复活,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荷马”一词在这里不仅仅指那个传说中的盲诗人, 而是代表着一种独特地看待世界的方式, 难怪西塞罗说荷马虽然目盲, 却让我们能够看清这个世界(Tuscul. V. xxxix. 114)。荷马之所以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 就在于他是“希腊的教育者”(柏拉图 Rep. 10. 606e2),^① 因此“荷马”也就代表着一种培育人性的诗教传统: 荷马史诗的美学意义正在于“成”人之美。荷马之死意味着我们彻底失去了帮我们看世界的那双伟大的眼睛, 意味着希腊智慧的消散, 意味着人性的漂浮无根。结果, 犬儒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 处士横议、数典忘祖, 其直接的代价就是动荡、战争、革命、牺牲、伪学、假知、绝决、冷漠、时尚(p. 123), 总之, 一个“新黑暗时代”(New Dark Age)业已来临(p. 77)。

现在到了非盘点不可的时候了: 谁杀死了荷马, 为什么?

大而化之地看, 荷马之死是历史造成的, 世风日下是“主义”带来的。“两百年的浪漫主义及其对释放被压抑情绪的尖叫(primal scream)的信仰, 对人的暴烈本质的信仰——这种本质陷溺在社会的丑陋垃圾中窒息, 甚至启蒙运动对人通过纯粹理性而得救的绝对且傲慢的信念——这种说不清楚的纯粹理性剥

① 另参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tr. by Gilbert High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5.

离了习俗、传统和宗教，正是这些信仰和信念差点毁了我们”(p. 41)。就在这个普遍认为是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各种“先进”的学问应运而生，比较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和比较文学等等，各自占山为王；各种“进步”的主义和学说泛滥成灾，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文化理论和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纷纷裂土封疆。

就在这个理论“战国”时期，有人指责说“荷马应为其缺乏现代感觉能力而负责”(p. 135)，女性主义古典学家则批评说，西方悲剧经典《安提戈涅》“是一部让人难受的父权制作品，主要强调了妇女的从属地位”(p. 98)。新文化理论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构荷马的文本，研究同性恋的学者拿着放大镜拼命寻找阿喀琉斯和帕特罗克洛斯之间蛛丝马迹的断袖证据，多元主义者则不遗余力攻击荷马的精英思想和种族沙文主义(却没有人去攻击科学的“精英结构”)，相对主义把一切都变成文本，以此消解真理、意义和价值，并嘲笑荷马绝对主义的“宏大叙事”。现代人不断生造术语、大放理论卫星，为的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甚至媚俗求荣，无非是“发明一种新病，然后吹牛医好了它”(invent a new disease, then brag of its cure. p. 42)。在多头并进的“时代精神”攻击下，“荷马”成了奴役、压迫、剥削、不合时宜(前现代)、性别歧视、文化帝国主义、非科学、天真、陈腐、极端和绝对的代名词，成了西方文化的毒素(toxic, p. 98)。

尼采把他以前几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总括为“虚无主义”，那两个“疯子”教授则把二千年西方历史命运的痼疾叫做“后现代主义”。尽管这种理论新贵“愚蠢、无聊、毫无意义”——现在我们还注意不到那种愚蠢，尽管这种已上升为新宗教的时代精神宠儿“既不新鲜也无深意”(neither novel nor profound)，但正

是受到后现代主义者这种“新智术师”(New Sophists)的冲击，谁也不会再用种族或伦理的术语“宏大地”地谈论“希腊人”，那会被人视为幼稚、愚钝甚至反动，怕丢脸和落伍(shame and passé)。谁杀死了荷马？——“廉价而俗丽的”(tawdry)时代精神。

流风所被，教育也大受污染，结果变成了弑祖或杀害荷马的帮凶。大学教育不再是为了把青年培养成有智慧、懂技艺并渴望过一种有思想的、道德的和积极的生活，其教育理念注重的是实用，不问人品和德性，“在现代性、实用性(relevance)和意识形态成为新符咒的大学校园里，绝对、规范、记诵和传统价值则毫无容身之处”(p. 82)。现在的大学丧失了古典教养教育精神，便会开出“走路的理论”(The Theory of Walking)、“星际旅行与人性”(Star Trek and Humanities)和“职场攻略”之类的愚蠢课程。“扩招”是人口爆炸时代的平民教育之必然结果，老师们教学任务繁重，无心也无力于研究和充电，知识贬值又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教授们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终不能好好教书。结果，“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精英”，包括律师、医生、政客、专栏作家和大公司的巨头，“现在毫无道德可言，你就必须去找训练他们并给他们颁发文凭的‘良师益友’”(mentor, 这个词似乎就来自于荷马史诗)(p. 154)。

教育败坏是荷马之死的原因，也是荷马之死的必然结果。曾几何时，古典学是大学的主干课程，古典学系的主任也是大学头面人物。哪怕就在三十年前，水管工、厨师或农夫都学过一年的古典语言，马马虎虎还可以对付T恤衫上的几个古典词汇。而今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占了大学的主要份额，古典学就像埃及学或玛雅学一样，快要变成学科木乃伊了。

大学本来是荷马最后的避难所，现在也成了荷马的陵园，大学图书馆真成了荷马的安息之地！

在当今世风之下，古典学教育乃是一件孤独、困难、艰巨却十分光荣的任务，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教希腊语已不再是写写专业论文，上上大课，解答学生词法句法方面的疑惑。在全世界都只知道如何教(how)、却不知该教什么(what)的时候，教希腊语也上升为传道授业的大事了，因此：

教希腊语就是要承担在课堂上靠演讲、质疑和回应来引导、纠正和培育学生的全部责任。……教希腊语意味着创立新的班级和教职，随时随地在说起或写到一星半点希腊人的东西时，都要扩展这个领域。就是要把希腊人放在心上，言行一致，成为一个能够吸引、领导，战斗、忍耐和牺牲……的奥德修斯和阿喀琉斯(p. 208)。

如此费力不讨好的活儿，谁会去干？虽然作者之一因在本科生希腊语和拉丁语教育方面的贡献而获得 1991 年度“美国语言学会杰出教育奖”(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ward)，但这样的老师毕竟凤毛麟角，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这位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那样有吹牛的资本，也难怪他四处骂人，说是“我们”杀死了荷马。

谁杀死了荷马？“我们”这些荷马专家或古典学者！

其实从 19 世纪初以来，“古典”一词已然变质，积重难返之余，古典学已变成一个甚为丑陋的行当：过去几十年古典学者的言论和作品倒了大众的胃口，他们开始从荷马的维护者变成叛徒，为了哗众取宠而放弃希腊人的智慧，“我们”现今这代古典学

者不少人为了奖赏甚至出卖希腊人，以一种自杀的方式换取暂时的利益。课堂、系部以及大学的所有部门都在全力以赴让新雇主（消费者）满意，用现代的流行色给古典学涂脂抹粉，以作个人晋升的阶梯。学者们在“古典学难”（类似于佛教的“法难”）之时，或洁身自好，或自暴自弃，或孤芳自赏，或望风归降，力表忠心且为虎作伥。古典学领域变成了屠戮荷马的“道场”。

古典学者不能或不愿去理解其专业困境，也不作出必要的牺牲，满脑子“终身教授”（tenure）、“课题经费”、“客座教授”、“协会主席”、“学术委员”等等。野心勃勃的古典学家为此搜肠刮肚苦心雕琢惊人之语，大吹特吹学术泡沫，大玩特玩理论游戏，用不同面料的“新装”来打扮荷马，既维持其上镜率，又可不断加长其学术目录。除了不正正经经研究和老老实实教书以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几无铁肩担道义，唯见熙攘为利来，不惜斯文扫地以至相互谩骂并展开人身攻击，比如 Martha Nussbaum 与 David Cohen 就对簿公堂，大名鼎鼎的 Kenneth Dover 与 Trevor Aston 简直不共戴天。就连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也免不了为追名逐利而相互叫劲，古典学就更言下无“虚”了。

就算残存几个严肃的学者，也都被裹挟到了异在的领域里瞎掺和，“借寇兵、资盗粮”而不自知，他们对荷马的研究适足以杀死荷马。在墙倒众人推之时，甚至古典语文学家也成了败家子：把文明史上最有影响的英雄叙事降低为性倒错和叙述漏洞的沼泽。我们虽然需要新方法来研究古典学，但对理论工具的滥用却使得病情不断恶化，20 世纪 80 年代的理论“繁荣”就说明了成之反而败之的辩证法。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抖出古典学内部猛料的学者把

希望寄托在施里曼(Henrich Schliemann)、帕里(Milman Parry)、伊文思(Arthur Evans)和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身上，以为荷马在他们手中复活了，至少劫后余生的荷马有望等得到下一代守望者。殊不知他们(包括《故事的歌手》的作者洛德在内)的兴趣主要不在荷马，而在于所谓“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试图用语文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科学”手段来解决甚至覆盖荷马史诗本身。据说“荷马问题”的现代发起人沃尔夫(F. A. Wolf)用语文学的工具来解决包括政治和宗教在内一切问题的做法，已着后来结构、解构的先声。现代学术死盯着“荷马问题”不放，忙不迭地“发现”新史料和新理论，除了荷马史诗外，什么都研究到了。^① 难怪人们总觉得荷马问题的兴起与古典教育的衰亡之间，肯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② 时代精神愈发走向封闭，亦似乎“合情合理”。

归根结底，杀死荷马的不是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也不是政府机关，更不是现代一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科学，而是古典学家。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是为了短期利益，为了少量微不足道的职位和头衔以及大把的钞票，正是古典学家的懒惰、贪婪和傲慢毁了古典学事业。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现代学术体制如此、时代风气如此，佳人又何以作贼、良人又怎会为娼？古典学家不是理由的理由，就在于目前的形势逼迫他们不断地拆毁祖庙以迎合大众的需要，只有靠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保住人们对它的感觉，陷入恶性循环的古典学掉进了一个深刻的悖

^① Joachim Latacz. *Homer, His Art and His World*. Tr. by J. P. Holok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 ix.

^② F. M. Turner. The Homeric Question, see Ian Morris and Barry Powell (eds.).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Leiden: Brill, 1997, p. 142.

论中：自杀以求自保和繁荣！

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或者如那位疯子尼采所说的：“谁能揩掉我们身上的血迹？用什么水可以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必须发明什么样的赎罪庆典和神圣游戏呢？这伟大的业绩对于我们是否过于伟大？我们自己是否必须变成上帝，以便显出上帝的尊严而抛头露面？”虽然现在自以为是的“原创性研究”在荷马、赫西俄德面前显得十分可笑，但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杀死荷马之后，仿佛已取而代之矣。在人们眼中，上帝都不算什么，《圣经》都可随便摆弄，荷马又算哪门子英雄？本来不成问题的传统价值，也成了需要辩护的问题：荷马死就死了，有什么了不起？或者再阿 Q 一点：大丈夫死则死耳，何必饶舌！

但问题偏偏在于荷马不能死，因为荷马一死，就再也没有神圣者高飞到永恒领域，从那里带来光与火，那么美德、爱情、友谊又算得什么？我们生息其间的宇宙的美景又算得什么呢？我们对此际的安慰和对彼岸的企求又算得什么呢（雪莱语）？荷马一死，古典学乃至大学就离死不远了，最优秀的分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荷马能够让我们清楚自己的位置，明白当今何以如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懂得，时过境迁三千年我们并不比荷马时代的野蛮人更道德，我们所取得的进步不过是与时俱退的“悲剧性发展”（tragic development, p. xviii）。从肯定的方面说，荷马所代表的博雅教育让我们更加谦卑、审慎和明智，让我们更有历史感，尤为可取的是，博雅教育有一种内在的生长机制，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职业，都能够进行不断的自我教育，成为好人，过上优良的生活。如是，则国泰民安、天下大治矣。